

宋元文艺思潮论

吴新雷

山西师大学报(社会科学版)第24卷第2期1997年4月

—

提要 本文认为,宋元时期的文艺思潮中虽然存在“道统”与“文统”的矛盾与对立,但由于“道统”在文艺思想界始终占居统治地位,因而对宋元时期的诗学思想和神仙道化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关键词 道统 文统 佛学禅宗

全真道教宋元时代的文艺思潮,是儒家的道统观念和程朱理学占了支配地位。自宋初统一全国,结束晚唐五代的混乱局面后,为了巩固新的封建秩序,赵宋王朝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种种措施,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需要建立新的理论体系。宋代的理学便适应这种情况而产生,并直接被元代统治阶级所利用,甚至明清两代的思想界,也都蒙受其影响。另外,由于当时统治阶级提倡儒释道“三教合一”,道释观念既促成了理学的创立,又同时在文艺领域里发生了作用,主要表现是佛学禅宗影响了诗学,全真道教影响了戏曲中的神仙道化剧。

理学:道统与文统

所谓理学,实际上就是儒家道统观念在宋代的新发展,是佛教和道教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形成的一种新儒学。宋代的理学家很多,主要的是濂、洛、关、闽四大学派:北宋的周敦颐,取道家的太极图来说明宇宙和万物所以发生的道理,以阴阳五行解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,论证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合理性。他的学生程颢和程颐在洛阳讲学,吸收禅宗“明心见性”和华严宗“理、事之说”的佛学观点,论证人性与天理的关系,提出“顺天理,去人欲”的主张,奠定了以“理”作为中心观念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。二程认为宇宙的根源是“理”,也叫做“道”,所以“理学”又称为“道学”。程颢说:“为君尽君道,为臣尽臣道,过此则无理。”¹程颐则说:“凡眼前皆是物,物物皆有理,如火之所以热,水之所以寒。至于君臣父子间,皆是理。”²可见他俩说的“道”和“理”,实际上就是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和社会原则。当时关中人张载写了一篇《西铭》,鼓吹封建道德,程颐称赞它“明理一而分殊”,从而又提

出了“理一分殊”的新概念,意思是指每一种具体事物虽各有差别,但都统一在天理之下。南宋时朱熹在闽中讲学,进一步阐释这个论点说:“万物皆有此理,理皆同出一源,但所居之位不同,则其理之用不一。如为君须仁,为臣须敬,为子须孝,为父须慈。物之各具此理,事物之各异其用,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。”³这就是说,不管具体的君臣父子如何,变化,而封建伦理的总的原则是万古长存的。其基本思想是把封建秩序当作永恒不变的“理”,把孔孟之道当作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,目的是为巩固封建的专制主义统治服务,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赏识,被立为官方的正统哲学。

自理学创兴,宋代的思想界人人以传道自命。《宋史·道学传序》曾评述其源流说:“文王、周公既没,孔子有德无位,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,退而与其徒定礼乐,明宪章,删《诗》,修《春秋》,讫赞易象,讨论《坟》、《典》,期使五三圣人之道,昭明于无穷,故曰夫子贤于尧、舜远矣。孔子没,曾子独得其传,传之子思,以及孟子,孟子没而无传。两汉而下,儒者之论大道,察焉而弗精,语焉而弗详,异端邪说起而乘之,几至大坏。千有余载,至宋中叶,周敦颐出于舂陵,仍得圣贤不传之学,作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,推明阴阳五行之理,命于天而性于人者,了若指掌。张载作《西铭》,又极言‘理一分殊’之旨,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,灼然而无疑焉。仁宗明道初年,程颢及弟颐实生,及长,受业周氏,已乃扩大其所闻,表章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篇,与《语》、《孟》并行,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,下至初学入德之门,融会贯通,无复余蕴。迨宋南渡,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,其学加亲切焉。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,明善诚身为要,凡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之文,与夫孔、孟之遗言,颠错于秦火,支离于汉儒,幽沉于魏晋六朝者,至是皆焕然而大明,秩然而各得其所。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,而上接孟氏者欤!”足见理学家很重视圣人之道和四书五经,推其本源,实出于儒家的道统观念。

关于儒家的“道统”,《孟子·尽心篇》说:“由尧舜至于汤,五百余岁”,“由汤至于文王,五百余岁”,“由孔子而来,至于今”。孟轲的意思是隐然以传孔子之道而自命。唐代的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指出:“斯吾所谓道也,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武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;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!”韩愈一生学道好文,他以孟子的继承者自任,打出了恢复道统的旗帜,掀起了古文运动。

这直接影响到宋初的文坛,大家都把韩愈作为“道统”与“文统”合二而一的模范,如柳开在《应责》中说:“吾之道,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道;吾之文,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文也。”⁴但在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问题上,理学家与古文家发生了分化。理学家丢开了韩愈,不讲“文统”,只讲“道统”,他们认为“道”是目的,“文”只是手段或工具。理学家这种偏执的文学观,使文艺逐渐为道学气所笼罩,提出了“载道说”,甚至认为“作文害道”。

思想领域里的争论

“文以载道”这个口号,是理学家周敦颐首先提出的。他在《通书》第二十八章《文辞》中说:“文所以载道也。轮辕饰而人弗庸,徒饰也。况虚车乎?文辞,艺也;道德,实也。笃其实,而艺者书之;美则爱,爱则传焉。贤者得以学而致之,是为教。”这明确地表示了重道轻文的意思,但还没有完全否定文艺的价值。他反对的是“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”,反对徒有装饰或空虚的车子;如果车子里载的是道,即使装饰得美观些也还是可以允许的。然而程颢、程颐却唱出了重道而废文的高调,二程认为道德是“本”,文学只是附庸,必须先道而后文,因此指责“学文而及道”的韩愈是“倒学”:⁵“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。学本是修德,有德然后有言,退之都倒学了。”⁵所以理学家讲道统时便撇开韩愈,直接抬出周敦颐作为继孟轲之后能够传道的代表(见《说郛》本李元纲《圣门事业图》第一图《传道正统》)。二程认为文学与异端同科,发出了“作文害道”的谬论:“问:作文害道否?曰:害也!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,若专意则志局于此,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。《书》曰‘玩物丧志’,为文亦玩物也。”⁶这种道德观念的极端论者把文学看成了歪门邪道,把文艺创作视为玩物丧志,把文人看成是俳优浪子。在二程及其弟子们的头脑里,只有孔孟是圣贤,只有四书五经是唯一的教科书。他们要求作家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,做封建教条的传声筒,影响所及,道学压制了文学,摧残了艺术规律,破坏了形象思维,使宋元时代的一些诗文,带有不同程度的说教气味。道学家把词曲视为小道,把戏曲小说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。然则,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宋元戏曲和话本小说,在创作主题中展开了反道学反礼教的斗争,这是二程始料所不及的。

在理学家鼓吹道统观念的绝对权威时,思想领域里并不是没有斗争的。例如王安石“新学”和二程“洛学”的对立,就代表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。王安石是激进的改革家,他撰著的《三经新义》,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解

释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和《周礼》，在政治上推行变法革新，在文学上倡导“有补于世”。他以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，揭露和批判豪族地主的顽固保守派。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影响到南宋的陆游。全祖望和王梓材在《增补宋元学案》中补写的《荆公新学略》，就列举了陆佃、陆宰、陆游，认为他们祖孙三代是属于新学的系统。另外，在南宋朱熹的“闽学”盛行时，浙东学派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和叶适都展开了反道学的斗争。他们切救时弊的学说被称为“功利之学”，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思潮，直接影响到爱国词家辛弃疾的创作。

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：古文家与理学家的分歧

古文家处理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，也始终是跟理学家不同的。本来，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来说明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，说明内容决定形式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所以宋初理学家石介等批判形式主义的“西昆体”，反对浮艳的文风，对于发动诗文革新运动是起过进步作用的。但程朱学派愈演愈烈，把“道”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，抬高到吓人的地位，甚至企图以道灭文，这就扼杀了文艺创作的生机，不能不引起古文家的争辩。其实，在“道”的问题上，古文家和理学家基本上是一致的，都是带有强烈的阶级偏见的，都是代表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，宣扬封建道德的。古文家与理学家发生分歧和对立的焦点，主要是在“文”的问题上。理学家肆意贬低“文”的地位，连韩愈也不相信了；古文家则竭力维护韩愈的威信，力争抬高“文”的地位。从欧阳修的“充道说”到三苏的重视文采，便可以看出古文家力挽狂澜的卓越贡献。他们通过丰富的创作实践，对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们都举着“尊韩”的旗帜，继承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统，终于完成了宋代的“新古文运动”。欧阳修主张道统与文统合一，《答祖择之书》说：“学者当师经，师经必先求其意，意得则心定，心定则道纯，道纯则充于中者实，中充实，则发为文者辉光。”这种“充道说”的理论，就是文道并重的意思。发展到三苏，更进一步强调“文”的重要。苏轼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赞扬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”。原来，唐人李汉《昌黎先生集序》曾有“文者贯道之器”的说法，而苏轼在《欧阳修墓志铭》中宣称“吾所为文必与道俱”，这就具体地发展了“贯道说”，与理学家“先道后文”的主张唱了反调。苏轼受老庄思想影响，表现出重文轻道的倾向，再加三苏的“蜀学”是跟二程的“洛学”对立

的,因此被朱熹斥为异端。他把韩愈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三苏和陈亮都骂遍了,他指责苏轼说:“道者文之根本,文者道之枝叶,惟其根本乎道,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。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,文便是道。今东坡之言曰‘吾所为文必与道俱’,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,待作文时,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,此是他大病处。”⁷他又针对“贯道说”进行批驳:“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,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!文是文,道是道,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,若以文贯道,却是把本为末。以末为本,可乎?”⁸朱熹是坚持“载道说”的,他和二程一样,比周敦颐更强调“道”的重要性,所以他竭力反对古文家的“充道说”和“贯道说”。他在《通书解》中声称:“文所以载道,犹车所以载物。”“不载物之车,不载道之文,虽美其饰,亦何为乎!”宋孝宗淳熙六年(1179),朱熹从福建到庐山白鹿洞书院,广招门徒,扩大社会影响,形成了颇有声势的道学集团。宋宁宗即位之初,朱熹得到宰相赵汝贤的赏识,官至焕章阁待制,直接为宁宗讲“正心诚意”和“克己复礼”之学。但在庆元党争中,赵汝贤败亡。韩侂胄当政后,揭露朱熹道学的虚伪,道学被斥为“伪学”,定为“伪学逆党”,史称“庆元党案”,朱熹被贬病死。可是权奸史弥远暗杀了韩侂胄,在宁宗死后又发动宫廷政变,强行拥立赵昀(宋理宗)。史弥远当政后,重新树立道学的权威,加谥朱熹为朱文公。宋理宗看出程朱理学有利于强化封建统治,特颁手诏:“以周、张、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。”⁹并追赠朱熹为太师,封为信国公。将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“立于学官”,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课本。由于宋理宗的大力提倡,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统治地位从此确立,全面控制了教育界和文艺界。

元代仍奉理学 为官学

蒙古奴隶主贵族在侵入中原地区的初期,曾大肆破坏封建社会建立的一套文化制度,造成北中国政治经济的严重倒退局面。但从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(今北京)立国以后,随即进行了必要的改革。他作为新生的蒙古地主阶级和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,不管蒙古贵族中奴隶制残余势力的反对,毅然“遵用汉法”,建立了元朝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,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。忽必烈认识到程朱理学有麻痹人民、巩固统治的作用,便大力提倡,并征召儒学名臣,立孔庙,设学校。据黄宗羲《宋元学案·北方学案》记载,元初著名的理学家姚枢、许衡、窦默、郝经、刘因等,都曾得到元世祖的重用。他们把南宋的理学

引到了北方,以大都为中心,建太极书院和周子祠,收集周敦颐和程朱等人的遗书八千余卷,广招门徒,讲学传道,直接为蒙古统治者服务。元世祖以后,从中央到地方也都崇奉理学,据《元史·许谦传》记载,元仁宗延祐初年,许谦在金华讲学,鼓吹:“学以圣人为准的,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。圣贤之心,具在‘四书’,而‘四书’之义,备于朱子。”金华地区有四个理学家,是朱熹的嫡派正传,从宋末的何基到元代的王柏、金履祥和许谦,“江浙行中书省请于朝,建四贤书院,以奉祠事,而列于学官”。足见元代的统治阶级仍然奉行程朱理学,以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来规范人们的行动。在这种思想统治下,元代的诗文创作也仍然以“载道说”为准则。影响到戏曲小说的作品中,也往往夹杂一些封建道德的说教。

元代正统文学的作家,大都是理学名臣,正如《元史·儒学传序》所说:“六经者,斯道之所在,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。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,而文不本于六艺,又乌足谓文哉,由是而言,经艺文章,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。”可见元代官方的文学思想,是跟宋代一脉相承的。

佛学禅宗对诗学的影响

宋元时代的文学创作,还直接受到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。“三教合一论”使文艺界援佛入儒、援道入儒的情况相当普遍。最典型的代表者是苏轼,他出入庄、释,融化佛、老,把禅宗的妙语机锋和道家的玄言妙理注入诗文,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禅宗是佛学中的主要流派,创始于北魏时期,正式形成于唐代。禅宗和所有的宗教哲学一样,也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。但由于它提倡“顿悟”、“呵佛骂祖”,似乎具有反传统反偶像崇拜的大胆作风,在儒家正统思想钳制下找不到其他理论武器时,往往能给人以一种新的启示,因此到宋代大为盛行,渗入到社会各阶层和各个思想领域。连市民文学的“说话四家”中,也有参禅悟道的家数。至于士大夫文人,更以参禅之法从事创作,以禅理、禅典、禅趣为诗,成为时尚的风气。苏轼《书楞伽经后》说:“近岁学者各宗其师,务以简便,得一句一偈,自谓了证,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,争论禅悦,高者为名,下者为利。”¹⁰这种读禅说诗还影响到文学评论,促进了“诗”话的繁兴。如南宋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认为:“禅道惟在妙悟,诗道亦在妙悟。”他比诗于禅,通禅于诗,

借禅理说明诗理,创造性地融合了诗学与禅学。另外,诗坛之分宗派,也是受禅学影响的结果,如宋末元初方回在《瀛奎律髓》中确立江西诗派的“一祖三宗”,实即得自禅宗各立门户的启示。他宣称:“诗为禅客添花锦,禅是诗家切玉刀。”这反映了宋元诗坛流行的一种风气。元代高僧中以诗文著名的作家很多,如圆至、大让和普真号称“诗禅三隐”,还有明本、行端、子庭等,都是元代杰出的诗僧。

全真道教对神仙道化剧的思想影响

道家本是先秦诸子中学术流派的名称,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。至于后世作为一种宗教,则是东汉末年张道陵创建的。张氏凑合巫术、谶纬等迷信杂学,牵强附会地把老子奉为教祖。宋元之世的统治者都曾利用道教来愚弄各族人民,宋徽宗甚至自称为“教主道君皇帝”。及至北宋沦亡,金人入主中原,南北分裂,道教也开始分立派别。《元史·释老传》记有四派:正一天师道是张天师以来传统的道教旧派,全真、大道和太一三派则是在金人统治区的北方出现的道教新派。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全真道,其势力范围遍及今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山东一带。戏曲文化中的神仙道化剧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并流行起来的。

全真教的创始人是王重阳。当北中国沦落后,一些无所寄托的北宋遗民,既不愿依附女真族奴隶主统治集团,又无力斗争反抗,便纷纷退隐,消极避世,王重阳的全真教,就是适应这种乱世而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需要而创立的。所谓“全真”,无非是保全其高洁的操守的意思。王重阳开始是在陕西终南山传道,金世宗大定七年到山东昆山仓山,发展了郝大通、丘处机、马丹阳、谭处端、刘处玄和王处一六个徒弟,声势大盛。元人《郝宗师道行碑》记述:“道家者流,其源出于老庄,后之人失其本旨,派而为方术,为符箓,为烧炼,为章醮,派愈分而迷愈远,其来久矣。迨乎金季,重阳真君不阶师友,一悟绝人,殆若天授。起于终南,达于昆山仓,招其同类而开导之,锻炼之,创立一家之教曰全真。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,除情去欲,忍耻含垢,苦己利人为之宗。老氏所谓‘知其雄守其雌,知其白守其黑,知其荣守其辱’,‘为道日损,损之又损,以至无为’。庄生所谓‘游心于淡,合气于漠’,‘纯纯常常,乃比于狂’,‘外天地,遗万物’,‘深根宁极’,‘才全而德不形者’,全真有之,老庄之道于是乎始合。重阳唱

之,马、谭、刘、丘、王、郝六子和之,天下之道流祖之,是谓七真,师其一也。”¹¹ 这说明了全真教的源流、教义和特征。它不搞烧符炼丹,而提倡修真养性,实际上是吸收了理学、禅学和老庄思想的一些哲学因素,以“忍耻含垢”和“苦己利人”为宗旨,因此受到沦陷区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欢迎和信仰。到了蒙古灭金前后,北方地区长期陷于战乱,全真教作为精神麻醉剂,又被元太祖成吉思汗所利用。成吉思汗西征时,特请长春真人丘处机到中亚等地传道,全真教从此在整个元代得到政治上的优待,广为流行。当时的道士欢喜和文人交往,他们填词作曲,互相唱和。特别是元代杂剧中,“神仙道化”和“隐居乐道”两类作品,都与全真教直接有关。如马致远的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、《马丹阳三度任风子》、杨景贤的《王祖师三化刘行首》、岳伯川的《吕洞宾度铁拐李岳》等,总不外是真人现身说法,度脱成仙。——由此可见,任何文学现象都是有其思想根源的,都是受文艺思潮所影响的。

注:

12、56 《二程遗书》卷五、卷十九、卷十八。

3、7、8 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八、卷一三九。

4 四部丛刊本《河东先生集》卷一。

9 《宋史·朱熹传》。

10 《东坡集》卷四十。

11 《道藏·甘水仙源录》卷二。